

DM73/0604

吴炜华 著

中国秦汉文学史

人民出版社

本卷提要

本卷起自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秦王朝建立,迄于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 195 年)军阀大混战,共包括秦、西汉、东汉三个封建王朝。其基本内容有“秦汉文学概述”、“秦代文学”、“汉代赋体文学”、“汉代散文”、“汉代诗歌”、“汉代文学批评”、“结语”七部分,大体涵盖了这一历史时期内所有的文学现象。

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学承传先秦的肇始期,从自发向自觉过渡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虽然总体上的文学意识还较模糊,但文学毕竟已基本上从学术中分化而出,涌现了众多的文学家,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发展出较丰富的文学品种和文章形式,文学批评也渐趋活跃,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貌;然而各类文学的发展又不大平衡,所取得的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也存在差异。鉴于上述特点,本卷在撰写时,不取一般文学史将各种文学品类混在一起,按时代平推介绍的方法,而是分文体专章论述,以突出各自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此外,于专章论述中,在全面把握文学现象的基础上,充分重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思想观念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既翔实地展现文学的客观状况,也力求探寻形成此种状况的内外动因。再者,由于汉赋作为两汉四百年文学的主流,在文人普遍创作的基础上不仅出现了杰出的专业作家,而且形成了创作中心,在文学史上率先表现出文学的自觉,无论是文学题材、艺术表现手法,抑或文学审美意识等方面,均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故此,本卷将其列为重点,不带偏见地恢复其本来面貌,重新评价其历史作用。

目 录

中国秦汉文学史

一、秦汉文学概述	1
二、秦代文学	8
三、汉代赋体文学	14
(一)汉赋的源起、文学特征及其兴盛原因	14
(二)西汉前期赋的创作	21
1. 贾谊	22
2. 枚乘	30
3. 庄忌及淮南小山	33
(三)西汉中期赋的创作	35
1. 司马相如	35
2. 武、宣赋坛	42
(四)西汉后期赋的创作	50
1. 扬雄	51
2. 刘向与刘歆	57
(五)东汉前期赋的创作	60
1. 建武赋坛	61
2. 班固	62
3. 永平、建初赋坛	66
(六)东汉后期赋的创作	69
1. 张衡	70
2. 桓、灵赋坛	76

(七)汉赋的价值、成就及其嬗变的根本原因	80
四、汉代散文	84
(一)汉代散文的总体状况	84
(二)西汉前期的政论散文	85
1. 贾谊的散文	86
2. 晁错及其他政论作家	88
(三)西汉中期的散文创作	92
1. 董仲舒	93
2. 司马相如、东方朔和王褒	94
3. 《淮南子》	97
4. 桓宽与《盐铁论》	101
(四)司马迁与《史记》	104
1. 司马迁的生平与思想	104
2. 《史记》的总体概况	107
3. 《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	109
4. 《史记》文学上的地位和影响	116
(五)西汉后期及东汉散文	117
1. 刘向与扬雄	118
2. 东汉文坛	123
(六)东汉时期的历史散文	127
1. 班固及其《汉书》	127
2. 《吴越春秋》与其他杂史	133
五、汉代诗歌	136
(一)汉代诗歌的总体状况及形成原因	136
(二)汉代乐府诗歌	141
1. 关于汉乐府	141
2. 汉乐府民歌的文学成就	147

3. 汉乐府民歌的地位和影响	162
4. 汉代民谣	163
(三) 汉代文人诗歌	167
1. 概说	167
2. 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	169
3. 署名文人的五言诗	172
4. 佚名文人的五言诗	175
六、汉代文学批评	183
(一) 汉代文学批评的总体状况	183
(二) 《毛诗序》与抒情言志的诗歌理论	187
(三) 围绕屈原楚辞而出现的文学论争	191
(四) 王充的文学批评	196
七、结 语	205

一、秦汉文学概述

公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在相继灭掉韩、赵、魏、楚、燕之后，又派大将王贲从燕地向南挥戈攻齐，生俘齐王建，六国遂平，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自称始皇帝，建立了秦王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也使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名符其实的大统一。这种大统一不仅是政治上的统一，正如当时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所说：“……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史记·秦始皇本纪》）而且也表现为军事统一，经济统一，文化统一，即所谓“车同轨，书同文”。从此以后，在世界的东方，在中国大陆上，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就对自己的祖国，表现出了一种无比强大的向心力，虽经多次内乱与外患，但仍然“分久必合”，保持了文化文明诸方面从未间断过的连续性，使华夏炎黄子孙始终得以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前所未有的大统一，不仅在更广阔的背景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而且也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但是，由于秦始皇和先秦法家一样，过分迷信武功、法吏而轻视文治，完全接受了法家“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的偏颇的理论主张。尤其在他晚年（公元前 213 年）在社会矛盾已经十分尖锐，社会危机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又错误地接

受了不懂得如何守成的法家人物李斯的“焚书”建议，严酷地推行旨在愚民的文化专制政策，妄图以此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结果更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致使“坑灰未冷山东乱”^①。到秦始皇死后第二年（公元前 209 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秦王朝自建立只短暂的十六个年头，就在公元前 206 年被刘邦、项羽的起义大军推翻了。

秦王朝覆灭后，又经过四年的楚、汉之争，到公元前 202 年刘邦击败项羽，重新统一中国，定都长安建立了汉王朝，史称西汉。

汉承秦制，是指汉王朝从本质上承继了秦王朝以郡县制为典型特征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国家政体，以及制定了与此相应的诸如律令、军法、历法、礼仪等一整套制度，而并非是说也继承了秦王朝极为酷虐的政治统治。相反，由于“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匱，自天子不能具钧駟，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发自草莱之间，以农民起义取得政权的汉高祖刘邦，深知广大人民百姓渴望得到休养生息，故而改变了秦朝酷法严刑的督责之术，采取了对百姓一定程度的让步政策，即位仅三个月后，便遣散部分军队，令士兵归田，并下令招集流亡者各归本县，凡是庶民因饥饿贫困而卖身为奴婢者，一律释免。又定律令，抑商贾，轻税役，和匈奴，铲除成为割据势力的异姓诸侯王，迁徙山东六国旧有的豪强十余万户入关中，从而为恢复生产，巩固新政权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汉高祖之后，无论是惠帝刘盈，还是文帝刘恒、景帝

^① 见唐章碣《焚书坑》。

刘启,都崇尚“黄老”思想,倡导“无为而治”,继续奉行相对宽松的与民休息政策,特别是经过长达四十年的“文景之治”,不仅进一步从制度上解决了同姓诸侯王的割据势力,使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更加巩固,也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亿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上》)遂使西汉王朝发展到顶峰,促成了中国历史上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的第一次繁荣昌盛。因此,随着秦王朝的建立所实现的国家大统一的政治局面给社会进步带来的种种优势,对文明发展提供的种种契机,才真正发挥出积极的效应;而文学创作的繁荣,尽管因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还有相当漫长的曲折道路,但是也毕竟从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以更大的步伐向前迈进了。

汉代逐渐繁荣起来的文学,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产生于战国后期的赋。因为赋才是两汉四百年间,从总体创作实况来看发展得最昌盛,最富于艺术的审美价值,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也最先表现出堪称为自觉创作意识的文学品种。早在西汉初期,这种文学体裁就已经开始风靡,不仅有此时最杰出的文学家贾谊的传世名作《吊屈原赋》、《鹏鸟赋》等,而且甚至先后在吴楚地区的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的府中,集中枚乘、庄忌、枚皋、司马相如等一大批艺术风格各异的名家,形成了影响很大的创作中心。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这位汉赋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早年正是仰羨梁孝王府中的赋家名望,才辞官前去投奔入盟的。不仅如此,在淮南王刘安府中,竟还出现了“淮南小山”、“淮南大山”这样的集体创作笔名。从作品数量上

看,仅据《汉书·艺文志》依一百多年后汉成帝时刘向校宫中秘书所整理著录的,就多达一百七十二篇;考虑到这些创作属于地方私家作品,不可能全部入宫保存,一百多年后的刘向未必得见,故而实际一定不止此数,足见创作之富。从作品艺术价值看,不仅现存枚乘《七发》是汉散体大赋的奠基之作,而且淮南小山《招隐士》也是骚体赋中极具艺术魅力,被称为“绍楚辞之余韵,非他词赋之比”的优秀作品。而到西汉中期的武、宣时代,由于国家鼎盛,帝王欣赏,更为赋体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温床。创作中心从地方诸侯移往中央帝京,创作规模也较以前愈加扩大,不仅出现了作为“言语侍从之臣”的专职赋家在“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且公卿大臣也在“时时间作”,数量之多,艺术成就之高,使赋体文学成为后世称道的“两汉文章之盛”的代表。这一时期,既有将汉赋推上发展顶峰的天才赋家司马相如,以其宏丽的《子虚赋》、“古妙”的《长门赋》等雄踞赋坛,也有堪称最富于艺术情趣的优秀赋家王褒,以其美仑美奂的《洞箫赋》创造性地完成咏物之体,还有艺术个性极为鲜明的东方朔,以其利刃般辛辣嘲讽的《答客难》又开新风。不仅如此,据《西京杂记》,司马相如甚至还提出了“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赋心说”,从创作理论上阐发了“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通过艺术构思,描绘艺术形象的赋体的美学特质,标志着汉赋已经发展成为成熟的文学样式。尽管这种艺术形式本身具有弊病,诸如结体庞大而臃肿,重体物而轻抒情,往往表现出很强的颂圣应制性,常有“劝百讽一”的缺欠等,从而在全面反映社会生活、真切抒发作家内心情志上受到限制。但是,它毕竟在当时独一无二地以审美的观照,艺术地再现了泱泱大汉的图景,强烈地反映了时代精神,而且为我国文学体物手法的发展、表现题材的开拓等等

方面，作出了前无古人的重大贡献。

这一时期散文创作也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虽然纯文学的散文作品很少，绝大多数都是应用性很强的文章著作，但是从中所显示出的艺术价值却是巨大的。散文在这一时期所发挥的积极的社会作用也是其它文学体裁所不能比的。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有效地说服了秦王政放弃错误的逐客令，促进了统一六国的历史进程。而西汉初期以贾谊、晁错为代表的政论散文，或则雄肆磅礴，或则沉实透彻，在总结治乱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解决现实面临的重大困难上，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应指出的是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的问世，更使这一时期的散文放射出灿烂的异彩。《史记》不仅被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史家绝唱”，而且又以其所开创的传记体文学，极大地丰富了文学样式。除此之外，宣帝时桓宽《盐铁论》，也以其全面而丰富地反映武帝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方面社会现实的内容，以及简劲明快、自然流畅的语言风格，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虽然比较沉寂，但是由于汉武帝大兴乐府，且采集民歌，毕竟也使当时北至燕、代，南达吴、楚，东起齐、郑，西抵陇西，遍及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直接来自民间“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间诗歌得以搜集、整理，虽然流传下来的不多，但从《汉书·艺文志》著录汉成帝时刘向校书所提供的六十三首数字来看，也较可观了。更重要的是，从此掀开了我国诗歌史上独具魅力的汉乐府的一页，对后世诗歌的健康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西汉从元帝以后直至灭亡的六十年间，由于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王朝衰颓，思想领域复古思潮隆起，文学创作也由武、宣鼎

盛逐渐下滑。大赋篇章,此时也少见往日文采。尽管有扬雄较为突出,以《甘泉赋》、《长扬赋》等作品成为继司马相如之后另一位代表性的赋家,但终因时代不同,既无“鸿业”可供“润色”,也无“上德”可供“宣扬”,本身臃肿颂圣、体物淹情的缺欠已经越来越显露出来,所以最终被他放弃,并从理论上批判其为欲讽反劝的“童子雕虫”,从而宣告了这种风靡一百多年的文学形式正在失去活力。然而,长时间居于支流的骚体赋,却由于适合文学家在王朝末日抒发内心的忧思悲慨,反倒顽强地表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出现了刘歆《遂初赋》这样以述行寄意显示赋体转变的较好作品。这一时期诗坛仍然寂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民歌谣辞的流行。民歌谣辞以特有的朴实尖锐直刺暴政,反映民瘼,而且其规整的五言形式,为后世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创新和发展作了准备。

公元8年,西汉王朝终于被自身的腐败所摧垮;篡夺了政权的野心家王莽建立的新朝,也由于更为暴虐,不过十五年就被农民大起义推翻。到公元25年,南阳豪强地主刘秀称帝,建立了东汉王朝,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东汉前期,由于吸取了西汉与新朝灭亡的教训,在政治上实行对人民的让步政策,政权逐渐巩固,又出现了国家安定繁荣的景象;但在思想上则加强了文化专制,推行今文经学的谶纬迷信,激起了具有进步思想的文人的抵制和斗争。到和帝即位后,统治集团内部宦官、外戚擅权乱政,东汉政权跌入黑暗腐败的后期,至桓、灵末世愈发不可收拾。这种社会现实反映到文学上,则明显地表现为保守与革新的猛烈撞击,从而呈现新的发展与变化。首先在仍居主导地位的赋体文学上,一方面班固从官方正统思想出发,重新从理论上全面肯定已经衰落的颂圣性质的大赋,并以更加庞大的篇幅创作《两都赋》,

企图重振西汉武、宣时代的声威,另一方面以抒情寄志为方向的探索革新的尝试也同时并行。张衡就曾以《二京赋》加强对时弊的针砭,最后终于以抒情小赋《归田赋》出色地完成了赋体革命性的变革,推动赋体文学走上了更具艺术活力的全新的道路,引出了蔡邕《述行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等优秀作品。

另外,在散文创作上,不仅出现了抨击统治集团大力提倡的今文经学、谶纬迷信,以及种种社会弊病的佳作,如桓谭的《新论》、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等,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班固以卓越的才识,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又撰修出了我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第一部杰出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汉书》以其体制的科学严整,内容的博大精深,开启了我国封建王朝延续不断的隔代官修正史的先河,不仅全面反映了西汉一代的社会整体状貌,而且成为仅次于《史记》的传记文学名著。

再者,在诗歌创作上,一方面乐府诗歌放射出夺目的光彩,迄今我们能见到的几十篇优秀作品大多出自东汉;另一方面文人诗也终于开始走出沉寂的低谷,无论是张衡、秦嘉、赵壹,还是未能传名的《古诗十九首》等篇的作者,都以他们优秀的诗歌创作,为五言诗体的成熟作出了重要贡献。

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学从初始的自为逐渐走向自觉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不仅表现在各种体裁作品的创作上,同时也表现在文学批评的日益活跃上。这时不仅出现了西汉毛萇的《毛诗序》、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序》、王逸的《楚辞章句序》等文学批评的论文,而且还围绕屈原楚辞和汉赋展开了激烈的文学论争。此外,在王充的《论衡》中,相对集中地针对文学创作的目的性、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作家的才学修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刻的理论探寻与阐发,很多观点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秦代文学

公元前 221 年由秦始皇建立起来的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从此,中华大地首次实现了名符其实的大一统局面。这种大一统广泛地深入到了从政治、经济至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不仅对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且也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由于一系列政治的历史的原因,诸如实行十分严酷的文化专制,使文学活动受到窒息,以致不可能利用大一统所带来的新的历史契机,在先秦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且立国过于短暂,前后仅十六年,使得处于残苛高压夹缝中的文学,来不及发挥自身顽强抗争的属性,形成富于时代特色的风貌,而犹如荒漠,虽然偶或出现零星的几丛植株,也大多被掩埋在一片虚空之中。故此,所谓秦代无文学之说就总体而言,大抵是符合实情的。

秦代文学家唯有李斯一人。李斯(?—公元前 208 年),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人。年轻时曾从学于荀卿;后入秦国,投吕不韦门下为舍人;又因吕不韦举荐,任为郎,受到秦王嬴政的赏识,累拜长史、客卿、廷尉,二十余年间辅佐秦王灭六国,实现统一。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秦王朝建立,拜为丞相。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在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谋立胡亥为二世皇帝。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曾针对某些政弊进行劝谏,但

遭秦二世严厉的责拒，于是转为阿意取容，竟献更酷虐的督责之术。秦二世二年（公元前 208 年），终为赵高所害，腰斩于咸阳，夷灭三族。

李斯在文学上以散文见长。其文上承战国荀卿，下启西汉邹阳、枚乘，不仅布局谋篇构思严密，而且设喻说理纵横驰骋，既重质实，又饶文采，往往文质互生，在寂寥的秦代文坛上一枝独秀。

李斯散文现传四篇，计为《谏逐客书》、《论督责书》、《言赵高书》、《狱中上书》。其中作于秦王政十年（公元前 237 年）的《谏逐客书》，是传诵千古的名篇。当时韩国为阻滞秦国的进攻，谋求耗蚀秦国的国力，故而派遣水工郑国入秦修灌渠。后被察觉，秦王嬴政遂在宗室大臣的怂恿下并不明智地颁布了逐客令。李斯为客卿，也在被逐之列，于是作此文，意欲谏止逐客。文章站在“跨海内、制诸侯”，“成帝业”的战略高度，紧紧抓住秦国利弊得失这一要害立论，起首即开门见山：“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言词委婉而意旨鲜明；接着就援引自春秋前期“缪公求士”至战国后期“昭王得范雎”，四百余年间秦国发展壮大的史实，从正反两方面极论“以客之功”；再以当前喜好非秦所产的四方享乐之物，而与取人则“非秦者去，为客者逐”作对比，指出“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入民也”的错误，然后经过分析，顺势极警醒地强调这种错误的严重性：“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求国无危，不可得矣”。全文立意高远，议论恢宏，不尚空谈，笔锋犀利，说理透辟，首尾贯通，一气呵成。在语言上也极富文采，例如：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鼉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

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馱馱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箏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文章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时而排比，时而对偶，时而设问，既严密整饬，又灵动多变；既词采富丽，具观赏美，又抑扬铿锵，具音节美，有明显的辞赋化倾向。此谏书呈上后，立即打动了雄才大略同时也刚戾自专的秦王嬴政，遂取消逐客令，对以后顺利实现秦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谏逐客书》可以说是语言运用艺术的直接实用性与审美价值高度统一的力作，历来为人们所宝贵。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曾赞誉：“……李斯之止逐客，并烦（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

《谏逐客书》作于秦统一之前，故而表现为文采斐然的战国纵横家风韵；但秦统一之后，李斯以丞相身份，作为“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法家“刑名之学”文化专制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实施者，其文风也一改富丽华美而为简质峭刻。这从秦二世时所作《论督责书》、《言赵高书》中即可看出。然而当他受赵高陷害，自觉面临生命之危时，为自己辩诬之作《狱中上书》，虽不为富贍华美，但全篇皆用反语宣泄受诬陷

获罪的满腔怨愤，感情激荡，表现出了很强的感染力。

李斯作品除上述散文外，还有碑铭。秦始皇先后曾五次巡行天下郡县，其中自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至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四次巡行中，都命李斯刻石记功，计有《邹峰山刻石》、《泰山刻石》、《瑯邪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七通。这些刻石铭文从内容上看，全为歌功颂德。例如作于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的最后一通《会稽刻石》：

皇帝休烈，平一字内，德惠修长。卅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四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愎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回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夫为寄猥，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全文以当时始皇帝“亲巡天下”至会稽“群臣诵功”写起，继而追颂因六国诸侯“暴虐恣行”、“数动甲兵”，奋而以“义威”，“殄熄暴悖”，使“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的丰功，以及统一之后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建立法度，扭转陋俗，推行共同伦理，“嘉保太平”的伟

绩,最后以随从臣僚“请刻此石”来“光垂休铭”作结。全文虽然充满了溢美之辞,但言简意赅,褒扬充分。从写法上看,除《邠邪台刻石》前为每句四言,两句一韵的韵文,后为散体,韵散相续之外,其余六篇皆为每句四言,三句一韵的韵文,具有明显的承袭《诗经》中雅、颂体式的特点,虽然形式上不免板滞之嫌,缺乏文学形象的审美价值,但是体貌庄重,气度雄壮,也颇显质朴廉劲之风。这些铭文作为现传最早的功德碑铭,为后世历代相沿的此类文章的撰著提供了范本,影响所及还是相当深远的,故而历来颇受重视。刘勰的《文心雕龙》不止一处予以评论,其中《封禅》篇云:“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箴铭》篇云:“至于秦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

秦代文学除李斯所作外,值得注意的还有诗歌。据班固的《汉书·百官公卿表》、杜佑的《通典·职官七》所记,秦时已有乐府的官署建制,掌管供皇帝享用的俗乐。史料所载内容,已得到证实。1977年在西安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了秦代错金甬钟的乐器,钟柄铸有秦篆“乐府”二字。有乐必有歌。《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曾使博士作《仙真人诗》,待此年巡行天下时,则“传令乐人歌弦之”。只是这些乐府诗歌早已失传,无法见其面貌。然而民间歌谣却有少量被记录下来,一直传至今天。如《三秦记》中所载的《甘泉歌》:

运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万人讴,金陵余石大如丘。

这首民歌的创作是由于“始皇作骊山陵,周回跨阴盘县(即今陕西临潼)界。水背陵障,使东西流,运大石于渭北渚。民怨之”(《三秦记》)。诗作杂言,声韵和谐,表现了当时百姓苦不堪言的